

「淵明墮詩酒」：蘇軾的和陶詩與陶詩的再評價^{*}

楊東聲

美國 Baylor University 外國語文學系

陶潛在一概中國現代文學史家的眼光中地位非常崇高，幾乎有飄飄欲仙之勢。劉大杰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說：「他有律己嚴正肯負責任的儒家精神，而不為那種虛偽的禮法與破碎的經文所陷；他愛慕老莊那種清靜逍遙的境界，而不與那些頹廢荒唐的清談名士同流；他有佛家的空觀與慈愛，而不沾染一點下流的迷信色彩。」¹ 陶潛在劉大杰的筆下好像一個完人。龔斌在《陶淵明傳論》中對陶潛的為人和作品也特別讚許：「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千百年來，人們對他讚不絕口。文如其人，這句話在淵明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² 陶潛是否真像學者所說的是那麼了不起的詩人，他的詩篇是否真的就是所謂文如其人那麼了不起，我以為頗值得商榷。其實在蘇軾以前，陶潛一般公認只是二流詩人。與他同代的學者顏延年在〈陶徵士誄〉中雖然稱許他的人品，但在談到他的詩文時只輕描淡寫地說：「文取指達。」³ 沈約《宋書·陶潛傳》不過引了他三篇短文和一首詩，介紹他的人品也只是說他不虛偽做作，「其真率如此」，⁴ 對他的詩文並沒甚麼特別的讚語。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根本就不提陶潛這個人。鍾嶸在《詩品》中提到陶潛，但是只給了他一個中品的地位。⁵ 蕭統對陶潛的評價雖然頗高，但是他的《文選》只收錄了七首陶詩和一篇〈歸去來辭〉，一共才八篇作品，這就說明在蕭統的眼中陶潛真正的好詩不多，

^{*} 本文惠承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編輯與審核學者的賜正，筆者在此特申謝忱。

¹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年），頁245。近年大陸和臺灣發表了不少有關陶潛的論文和書籍，論點大多雷同，對陶多是稱頌不已。

² 龔斌：《陶淵明傳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9。在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中，一個作家的人品和作品常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現代文學批評因受西方的影響，稍有改變，但是大體的趨勢還是二者兼談，如龔斌的評語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本文在分析陶詩的時候，有必要也附帶地探討他的人品。

³ 《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卷五七，頁806。

⁴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九三，頁2287。

⁵ 曹旭：《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260。

要不然他理當會多收一些。特別是蕭統收了陸機四十九首詩，謝靈運四十首，顏延年二十首，都比陶詩要多得多。如果單從蕭統收錄詩的數字來看，陶潛連顏延年都比不上。

到了唐代，提到陶潛的人比較多了，但是他們對陶潛的評語不完全都是肯定的。尤其唐代的大詩人對陶潛更多有微辭，像李白就認為陶潛的眼光狹隘：「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群。」⁶杜甫對陶潛的人和詩都不是衷心佩服的：「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⁷陶詩在當時一般的評價不是很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李白、杜甫所說的他的詩主旨頗為狹隘，而其中有些詩又索然寡味。曾經做到尚書右丞的王維以為陶潛缺乏涵養，沒有忍耐的工夫，說他因「一慚之不忍」以致「終身慚」：「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扣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⁸中唐的詩人韓愈在他的詩史中談到晉宋的詩時，連陶潛提都不提：「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⁹很顯然在韓愈的眼中，陶潛是根本比不上鮑照和謝靈運的。與韓愈約同一個時代的白居易雖然相當喜好陶潛的作品，但在談論詩文的作用時，也同樣批評陶潛，說他主旨狹隘，「偏放於田園」。¹⁰

陶詩受到普遍的尊崇跟蘇軾有絕大的關係。蘇軾晚年先後有十幾年的時間，不但大力推崇陶詩，甚至花了不少時間來追和陶詩。原來蘇軾打算和完陶潛的一百五十九首詩，但是後來因為政治局勢的改變，蘇軾對陶潛的興趣不再像以前那麼濃厚，所以只和了一百二十四首。雖然蘇軾沒能和完所有的陶詩，他對陶潛的為人及其作品的推揚卻從此在中國文學史上起了深遠的影響，改變了人們對陶潛的看法，大大提升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當然，如果蘇軾本人在文學史上沒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對陶潛的讚揚是不會起太大作用的。從很多方面來看，蘇軾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絕無僅有的天才。他從二十一歲考取進士以後，聲名鵲起。當時執文壇牛耳也正好是蘇軾座主的歐陽修在看到他的文章以後，大為讚賞地說：「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¹¹蘇軾的才華不僅得到師友的推崇，連他的政敵也不能不佩服。蘇軾在四十四歲時，因他詩中有批評時政的文字，被捕下獄，主勘他案子的御史中丞李定執意要定他個死罪，然而他在審問過蘇軾以後，對他超人的才華也不能不表示衷心的讚嘆：「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

⁶ 《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頁994。

⁷ 楊倫：《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五〈遣興五首〉，頁234。

⁸ 趙殿成：《王右丞集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卷一八〈與魏居士書〉，頁10。

⁹ 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薦士〉，頁355。

¹⁰ 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與元九書〉，頁648。

¹¹ 王應麟：《困學記聞》(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卷一八，頁1381。

誠奇才也！』眾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嘆息不已。」¹² 蘇軾自己不但才華無雙，他又收了許多文采出眾的門徒，其中黃庭堅、秦觀、陳師道、晁補之、張耒、李廌六位，甚有才氣，合稱「蘇門六君子」。他們時時跟蘇軾一起唱和，給他推波助瀾，蔚成聲勢。因此蘇軾登高一呼之後，陶潛聲名大噪。

蘇軾的名氣雖在徽宗時期因新舊黨爭的緣故遭到貶抑，但是在南宋時，宋廷對他再度褒揚。特別是宋孝宗對蘇軾其人及其作品都極為推崇，把他當成典範：「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朕萬機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亶亶忘倦，常置左右，以為矜式。」¹³ 自此以後，蘇軾在中國歷史上的盛名直到近代都沒再動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因為蘇聯的列寧讚許宋朝的新黨，否定舊黨，身為舊黨要員的蘇軾備受批判。文革以後，中共逐漸採取開放政策，蘇軾的聲譽又開始恢復，例如朱靖華《蘇軾論》一書對他推崇備至，說他是「曠世無雙的全能文士」，又說「蘇軾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也是世界人民的驕傲」。¹⁴

因為蘇軾的盛名，歷來研究和陶詩的學者頗多。大部份的學者因為蘇軾在〈江城子〉一首詞中說「只淵明是前生」，¹⁵ 都特別強調他與陶潛相似之處，而不怎麼提他們相異之處，例如朱靖華就是屬於此一範疇的學者。¹⁶ 另外一部份學者，他們雖然指出蘇、陶兩人有大相逕庭之處，但都沒能解釋蘇、陶所以不同的原因，只說蘇軾寫的和陶詩是自說自話，跟陶潛的詩沒有甚麼關係。清代的學者王文誥就是持這樣的看法：

公之和陶，但以陶自託耳。至於其詩，極有區別。有作意倣之，與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適與陶相似者；有借韻為詩，置陶不問者；有毫不經意，信口改一韻者。……此雖和陶，而有與陶絕不相干者。¹⁷

王文誥對和陶詩的看法一直影響到現代的學術界，像吳璧雍八年前發表的〈「我不如陶生，世世纏綿之」——試說東坡和陶詩〉一文依然沿襲王的觀點，以為有的和陶詩跟陶詩沒有甚麼關係。¹⁸ 如果蘇軾那些和陶詩真像傳統所說，跟陶詩沒有甚麼關係，

¹² 王鞏：《甲申雜記》（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4年），頁7。

¹³ 《蘇東坡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宋孝宗御製文忠蘇軾文集贊〉，書首。

¹⁴ 朱靖華：《蘇軾論》（北京：京華出版社，1997年），頁40。

¹⁵ 《東坡樂府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卷二，頁2。

¹⁶ 丁曉與沈松勤在《浙江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發表的〈北宋黨爭與蘇軾的陶淵明情結〉一文也屬於此範疇。

¹⁷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卷三九，頁3383。

¹⁸ 《故宮文物月刊》第208期（2000年7月），頁120-29。

我們就不能不問：為甚麼蘇軾還要稱他的詩是和陶詩？為甚麼他還要花精神用陶詩原來的韻及其格式，縛手縛腳的去和？為甚麼他不乾脆就寫自己的詩？我的看法是蘇軾所寫的這些和陶詩，不但跟原來的陶詩有絕大的關係，而且這些詩的深意也只有在跟原詩對比時才能特別顯示出來。

陶潛跟蘇軾其實是兩個迥然不同的人物。就如上述唐代的那些大詩人所說，陶潛不是一個才華絕頂的人，他的涵養有限，一生只做到一個不怎麼起眼的參軍，詩也只寫了一百多首。蘇軾就完全不一樣了，他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天才型人物，才氣縱橫，不但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也是政壇的風雲人物，身為當時垂簾聽政宣仁太后的侍從，同時做過八個州的知州，詩寫了兩千七百多首，詞三百多首，文章也有幾百篇。陶、蘇兩人固然有相同之處——為人直率，但區別也實在不小，這就是為甚麼蘇軾的和陶詩所以跟陶詩大不相同的原因了。在這一方面，蘇軾的弟弟蘇轍就看得很清楚。他們晚年放逐，蘇軾流放到海南島，蘇轍貶到雷州半島，蘇軾把他寫的和陶詩編成一集，寄給蘇轍，請他寫一篇引文，蘇轍就把他的看法很老實的給寫下來：「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哉！」蘇轍雖然實話實說，但蘇軾這時對陶潛的興趣可說正處於巔峰之際，所以他對他弟弟說陶潛是一個拙者的話就不太能欣賞，結果他自己動筆，把蘇轍的話改寫成如下一段文字：「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¹⁹ 蘇轍代表傳統的看法，蘇軾則有自己特殊的想法，最後在哥哥的請求下，弟弟也不好再堅持，就照了哥哥的建議把以前寫的那段文字給改了。

既然蘇軾與陶潛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為甚麼蘇軾還要寫和陶詩，而他所寫的和陶詩又往往跟陶詩有天壤之別？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探索他晚年在海南島時對陶潛的讚譽之辭：

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²⁰

¹⁹ 費袞：《梁溪漫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卷四，頁2。

²⁰ 蘇轍：《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二一，頁1402。

陶潛和蘇軾兩個都是耿直的人，與世多忤，這當然是蘇軾覺得陶潛跟自己相近、讚許陶潛的原因。除此以外，陶潛還能夠不為金錢勢力所迷惑，不以追求官爵為人生的目的，這就不是以前的讀書人個個都能做到的，也就是蘇軾所特別讚賞陶潛的地方。李白和杜甫大半生都熱衷於追求官爵，因此蘇軾認為他們都比不上陶潛。蘇軾對其人的看法有意無意中左右了對其詩的評價，所以他以為李杜的詩比不上陶詩。詩在中國文學史上一般公認是在唐代才達到峰巔，蘇軾把陶詩列在李杜之上，隱然以為中國詩到了陶潛的手中就達到了完美的境界，這種看法是相當偏頗的，歷史上不是每個人都同意他的看法。²¹ 儘管蘇軾對陶潛的為人和詩作都推崇備至，但陶潛在蘇軾的眼中並不是一個完人，否則蘇軾在詩中就不會常去批評陶潛，寫一些跟他意見相反的詩。

蘇軾寫和陶詩的政治動機

蘇軾所以那麼推崇陶潛，絕大部份跟政治因素有關。他早年接受一般傳統的看法，小視陶潛，只是在他中年被貶謫到黃州時，因在政壇失意，才開始對陶潛感到興趣。此後他對陶潛的興趣要看政治氣候，或高或低。他開始寫和陶詩是在元祐七年(1092)五十七歲那年，時在揚州任上。當時他的名銜是龍圖閣學士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知揚州軍州事，責任重大，事務倥傯，他怎麼會突然想到要寫和陶詩的？這主要跟他在前四年中政治上所遭遇的挫折有關。早在元祐三年(1088)三月，蘇軾因勇於論事，遭到不少臣子如朱光庭、王巖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人的攻擊；他對當時朝廷的政治局勢就已經大為失望，而不斷請求外調。當時掌政的宣仁太后一向支持蘇軾，還特別因此而召見慰勉他：「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²² 為了讓蘇軾安心工作，大約在他上了請求外調的笏子一個月以後，宣仁太后再度跟他坦誠交談，強調宋朝皇室對他的信任：

是夕，蘇軾對於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忽宣諭軾曰：「官家在此。」軾曰：「適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欲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軾曰：「汝州團練副使。」曰：「今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軾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軾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

²¹ 蘇軾具有政治動機的評譽雖然大大提高了陶潛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是就歷來詩家注本最多的還是杜甫這一個客觀事實來看，傳統的公論，一般還是以唐詩特別是杜甫的詩為中國詩創作巔峰的代表。

²² 《蘇東坡全集》，卷五〈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笏子〉，頁451。

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軾驚曰：「臣雖無狀，必不敢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²³

按照宋朝的常例，宰相一般都從翰林學士爬升上去。蘇軾才高名大，為人耿直，又得宣仁太后的信任，這時候已經任翰林學士知制誥，日後極可能升到相位。正因如此，他也常被深具野心、唯利是圖的同僚排斥。宣仁對蘇軾越信任，他的政敵就越感受到他的壓力，要千方百計地來排擠他和他的朋友門生。

這也就是為甚麼在宣仁幾次懇切的慰留以後蘇軾還是不斷請求外調。同年十月，蘇軾「以群小交攻，讒謗日至」，²⁴ 再次用健康不佳為理由，請求調離京師。宣仁還是照樣不准，此外又特別派了一個使者去看他：「臣伏蒙聖恩，特賜寬假將理。今月七日，又再蒙中使臨賜御膳，問其治療之增損，督以朝參之日辰。」²⁵ 雖然宣仁處處維護蘇軾，蘇軾本人疾惡如讎，為報答宣仁知遇之恩，遇事直言，因此當時因循固執的一些年老重臣也不是特別喜歡他。當蘇軾受到無理攻擊的時候，他們往往不挺身制止，而只是兩相調和。在這種情況下，蘇軾覺得應該把話跟宣仁說清楚，使宣仁對整個情形有所了解，好讓她對自己的去留做個合宜的決定。所以十天以後，蘇軾又上了一個笏子，把他在宣仁朝上供職以來的衝突都對宣仁說了。為顧全大局，他覺得還是應該離開京師：

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列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

²³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四〇九，頁236。

²⁴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三〇，頁1043。

²⁵ 《蘇東坡全集·謝御膳》，頁290。

雷同眾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²⁶

司馬光死後的宋廷，常起朋黨之爭，史家把他們一般歸成洛、蜀、朔三黨，就蘇軾來看，這些爭論多是意氣權力之爭，常無是非原則可說。即使得到宣仁維護，蘇軾被擠出朝廷也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果然，在元祐四年(1089)三月蘇軾上了這個笏子不到五個月的時間，當他再度請求外調的時候，宣仁被他的政敵纏得也煩了，就不再堅持，讓蘇軾以龍圖閣學士充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的名銜出掌江南一帶。

將近兩年以後，宣仁把蘇軾升任尚書右丞，心中可能覺得朝上的氣氛已經相當穩定，應該是把蘇軾調回京的時候了。所以在元祐六年(1091)二月下詔，給蘇軾一個翰林承旨的名銜要他回京。蘇軾連上三道辭書，請求不要內調，宣仁一概不准。蘇軾在勉強回京以後，再連上九道辭書，請求外調，宣仁還是不准。蘇軾跟他政敵的正面衝突因此不過是早晚的事。蘇軾在蘇軾去世以後給他哥哥寫的墓誌銘中回憶這段時期朝中對他哥哥回京的反應是：「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²⁷ 王文誥在他所寫的蘇軾傳記中，分析當時朝廷的局勢相當簡明扼要：「及劉摯代純仁為相，王巖叟為樞密使，梁燾為禮部尚書，劉安世久在諫垣，號殿上虎，招徠羽翼益眾。朱光庭、楊畏等失其領袖，皆附朔黨以干進。摯擢易為侍御史驅公，意在傾子由也，構難方急。」²⁸ 蘇軾本人先前在朝的時候，早已領教過那些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的宵小的技倆，這時朝中的局勢因范純仁被貶謫外地變得比先前更為惡劣，蘇軾當然是知道的。既然宣仁堅持要他回京任職，蘇軾就不能不把話給說清楚，也好讓宣仁對風雨欲來的情勢有個心理準備：「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軾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行至中路，果聞弟軾為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眾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軾。……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²⁹ 蘇軾所以不願意做當時很多人都爭著想要做的高層京官，並不是他怕那些只圖個人利益的小人，而是覺得他出仕的目的是要輔助君王來平治天下，而不是爭權奪利，更不是浪費時間做無謂的紛爭。

蘇軾既然回京，他就利用跟宣仁與哲宗日常接觸的機會提起江南一帶民生疾苦的事。蘇軾還在杭州任上，就已經上過九道狀紙，請求朝廷救助那些因天災人禍而

²⁶ 同上注，〈乞郡笏子〉，頁 456-58。

²⁷ 《樂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頁 1418。

²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頁 1148。

²⁹ 《蘇東坡全集·杭州召還乞郡狀》，頁 509。

瀕臨破產的貧苦大眾，但是朝廷在這一年多裏始終沒給他一個滿意的答案。因此在他回京一個多月以後，又接著上了一狀：「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為一，農民棲於丘墓，舟筏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數他郡。」³⁰蘇軾劄子一上，他的政敵賈易、楊畏、安鼎馬上就採取行動，告他「姑息邀譽，眩惑朝聽」，³¹要求朝廷懲罰他虛報的罪過。這些諫官只顧一己的私情，不顧百姓死活的作風很讓蘇軾痛心；而更讓他難過的是，朝中絕大多數官員都採取苟且觀望的態度：「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賴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即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勗偶非其黨，猶肯為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³²賈易這時不僅攻擊蘇軾，而且兼及蘇轍與秦觀，說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秦觀「污辱文館」。³³為了拯救百萬生民，制止賈易無理的行為，蘇軾請當時的御史中丞趙君錫出來說句公道話。趙君錫在此以前對蘇軾相當禮敬，一直都讓蘇軾覺得他是一個正人君子，是值得一交的朋友：「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外，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³⁴豈知此時趙君錫為了躋攀高位，奪取蘇轍的副相位，已經決定跟朔派合作，將蘇氏兄弟一起揪倒。因此當蘇軾請求趙君錫為「兩浙災傷」出言相助的時候，他利用機會反參了蘇軾一狀，說他「離開風憲」。³⁵蘇軾一生注重情義，趙君錫翻臉不認人，大概是最讓蘇軾對當時朝廷政局冷心的地方了。在這時候，賈易和趙君錫一不做，二不休，再找了一個幫手安鼎，三個人一起以蘇軾詩文大逆不道和一些其他的理由再參他一狀，很顯然希望置他於死地。

在這場糾葛紛爭中，蘇軾所犯的唯一錯誤是以侍從官的身份透過親友私下跟諫官趙君錫接觸。雖然宋朝的法制禁止政務官與臺諫互相往來，蘇軾跟趙君錫的接觸並不是為一己的私利，而是為了拯救百萬生民的性命，照理說應該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罪狀，但是朝廷大臣在元老呂大防的主張之下採取兩罷的決定，把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軍州事外調。半年多以後，又把他調到揚州。

³⁰ 同上注，〈乞將上供封樁斛斗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子〉，頁 513-14。

³¹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三五五〈賈易傳〉，頁 11175。

³² 《蘇東坡全集·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頁 515。

³³ 《續資治通鑑長編》，頁 1156，1158。

³⁴ 《蘇東坡全集·辯賈易彈奏待罪劄子》，頁 516。

³⁵ 《續資治通鑑長編》，頁 1158。

和陶詩

蘇軾到了地方上以後，獨掌一面，不再像在朝的時候，須要應付宵小同僚無理的糾纏，可以集中精神來處理政務，幫助當地居民。在蘇軾抵達揚州兩個月以後，於元祐七年五月和六月，先後兩次上書，重提他兩年前早就提過的寬宥地方貧民債務的問題：

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無此心，則臣亦不敢必望此政。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止矣。然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為臣子所格沮也。竊觀即位之始，發政施仁，天下聳然，望太平於期月。今者八年，而民益貧，此何道也？願陛下深思其故。若非積欠所壓，自古至今，豈有行仁政八年而民不蘇者哉！臣前所論四事，不為不切，而經百餘日，略不施行。臣既論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錄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臣知杭州日，預先奏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飢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糴。而發運使王覲，堅稱米貴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為甚賤，縱使貴糴，尚勝於無，而覲執所見，終不肯收糴顆粒，是致次年拯濟失備，……今來淮南始獲一麥，浙西未保豐凶，應淮南東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舊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³⁶

這段文字直言極諫，不畏權臣，處處流露出蘇軾對天下疲憊生民的惻隱之心，這應該就是後來孝宗所以特別欣賞他的地方了。蘇軾擇善固執，再三上書的做法，讓因循苟且的執政大臣毫無推托的餘地，只好照宣仁的旨意來處理蘇軾提出的問題。所以當朝廷在元祐七年七月下詔准許蘇軾所求，停止追討平民積欠一年的時候，蘇軾心中的喜樂是可以想見的，他就是在這個時候寫下他的第一首和陶詩〈和陶飲酒〉。

在這種感觸很大喜樂無盡的情況下，蘇軾寫和陶詩有他很深的用意。他絕不可能在他克服多層困難，完成濟助平民的心願，內心充滿喜樂的這個時刻，來歌頌陶潛逃遁退隱的思想。他和陶詩的第十一章就表示得很清楚，他不是要退隱，他只希望他的君王能時時以民生為重：「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暑雨避麥秋，溫風送蠶老。三咽初有聞，一溉未濡槁。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頽然笑阮籍，醉几書謝表。」蘇軾既然不是在追求退隱，那他寫和陶詩的目的是甚麼？他的門生晁補之當時在他的麾下做揚州通判，就看得很清楚。當蘇軾要他也跟著寫和陶詩的時候，他在〈飲酒二十首同蘇翰林先生次韻追和陶淵明〉就把其

³⁶ 《蘇東坡全集·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頁 545-46。

中的理由給說了出來：「藏鋒避世故，輕敵喪吾寶。」³⁷ 蘇軾的名氣才華、耿直的個性、鋒利的言辭，特別是人主的寵遇，在一般講求人事關係因循苟且的傳統政治中是很容易樹敵的。他這時候轉向陶潛去寫和陶詩可以給他的政敵一個印像，讓他們覺得他在熱切追求退隱的田園生活，對政治已經沒有很大的興趣，如此對他們角逐權力的企圖應該不再會構成嚴重的威脅。這就是晁補之所說的「藏鋒避世故」、韜光養晦、謹慎不輕敵的策略。另外一方面，蘇軾和陶詩還有他積極的一面。陶潛耿直的性格、不盲目追求金錢勢力，不但是當時那些只圖一己私利的官場人物所應該學習的，也是中國社會的讀書人所應當學習的。但是陶潛在蘇軾的眼中不是一個完人。陶潛逃離腐敗的政治世界，退隱到個人的天地之中，蘇軾並不以為是解決政治問題最好的方法。所以蘇軾的和陶詩常跟陶詩背道而馳。當陶詩提到對現實政治絕望的時候，蘇軾的和陶詩就常常掉轉方向，描寫他對平治天下高度的期望，似乎他在勸像陶潛一類的隱者不要對世事絕望，要像他自己一樣，不但以追求爵祿為人生終極的目標，同時還應該不畏懼邪惡，抱必死的決心來奉獻國家社稷。

陶詩與和陶詩的比較

在比較陶詩與和陶詩以前，需要先澄清一個誤解。歷來很多研究蘇軾和陶詩的人都把這些詩當做擬陶詩來看，討論兩者相似的地方，再據此品評二者孰勝孰劣。蘇軾自己說他的詩不是擬陶詩，而是和陶詩：「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³⁸ 蘇軾的詩既然是和詩，就沒有必要要跟陶詩相似，兩者只是用同樣的題目和文體來表達或同或異的觀點。比較陶詩與和陶詩的重點因此不應該是二者相似與否的問題，而是蘇軾針對陶潛的看法提出他自己甚麼獨特的見解。

蘇軾和了一百二十四篇陶詩，這裏篇幅有限，只能選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來進行分析。他的第一篇作品〈和陶飲酒二十首〉，樹立了他此後和陶詩的楷模，值得深入研究。陶潛在〈五柳先生傳〉中說他自己「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他在做彭澤令的時候，下令縣內公田全部種可以釀酒的小米。這種只圖個人口腹之樂，不顧家庭生計的做法，不是一個負責任的男子所應該做的。後來在妻子堅決反對之下，他只好將小部份的土地改種稻，以供家人糊口：「公田悉令吏種秬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秬，五十畝種粳。」³⁹ 陶潛辭官以後，他的朋友顏延之看他家貧，給他二萬

³⁷ 《雞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438。

³⁸ 《樂城集·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頁 1402。

³⁹ 《宋書·陶潛傳》，頁 2287。

錢，結果他「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陶潛家境貧乏跟他嗜酒、生活不太有節制不無關係。陶潛喝酒所以喝得很利害自然有他的原因，他在〈飲酒〉詩的序文中說：「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⁴⁰ 陶潛隱遁的生活並不是像現在一般學者所想像的那麼適意，他有他憂鬱愁苦的一面：「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⁴¹ 他在鄉間的生活單調勞苦，沒有甚麼樂趣，「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樂」；酒除了給他短暫的快感而外，對他來說也是一種麻醉劑，讓他能夠忘卻煩惱：「酒能祛百慮。」⁴² 所以他喝酒一定要喝到醉才停止。

蘇軾就完全不一樣了，他不會喝酒，為了應酬，跟朋友同僚聚會的時候，他順應時情，用酒來助興；喝的時候，他也常是淺嚐而止，能夠自我控制。他的和陶詩序文就說：「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薄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⁴³ 所以當蘇軾早年四十歲在密州任知州，對陶潛還不是特別有興趣的時候，他就曾經批評過陶潛的為人：「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歎。無絃則無琴，何必勞撫玩。」⁴⁴ 當時他的結論是陶潛和劉伶一樣，不但飲酒沒有節制，而且還有做作之嫌——陶潛彈沒有絃的琴；劉伶叫一個僕人背著圓鍬跟在他車後，準備他一死就當場把他給埋了。⁴⁵ 他的評語是：「孰云二子賢？」在將近二十年之後，蘇軾寫〈和陶飲酒〉的時候，雖然不公開批評陶潛，但是他的詩仍然很清楚的表示他跟陶潛不同：陶潛「期在必醉」，自己「過午輒罷」。

再過差不多八年以後（紹聖五年，1098），蘇軾六十二歲被貶到海南島的時候，他寫〈和陶神釋〉還是持同樣的觀點，說他不贊成陶潛的做法：「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⁴⁶ 酒和佛、道兩教對蘇軾來說都不能提供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法。等到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蘇軾北返，很多人都希望他能被命為宰輔。他所寫的詩〈和陶始經曲阿〉就再度公開批評陶潛，把陶潛看成一個墮落的讀書人：「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疏。我生值良時，朱金義當紆。天命適如此，幸收廢棄餘。」⁴⁷ 雖然蘇軾不同意陶潛隱遁的做法，但他話說得還是相當客氣，只說他們之所以不同，

⁴⁰ 《陶靖節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40。

⁴¹ 同上注，〈遊斜川〉，頁17。

⁴² 同上注，〈九日閒居〉，頁45。

⁴³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頁3195。

⁴⁴ 同上注，〈和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頁2111。

⁴⁵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四九〈劉伶傳〉，頁1376。

⁴⁶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頁3540。

⁴⁷ 同上注，頁3577。

主要是時代的關係——他比陶潛幸運，處在一個政治比較清明的時代——而不說他自己有堅忍的毅力與報國的決心。

陶潛〈飲酒〉第五首一般公認是陶詩中的上乘之作，用詞及語意都有獨到之處：「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首詩描寫陶潛退隱的生活，安靜恬適。詩中提到的南山是全詩的重點，陶潛和這座山遙遙相對，互相影射，陶潛這時內心的感覺似乎就如同南山一樣巋然不可動搖。蘇軾看到了這點，所以他在和陶的時候，就特意用了不同的意象，來表示他跟陶潛不同：「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發，不知枕几偏。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亦何為，此道常往還。未來寧早計，既往復何言。」這首詩描寫蘇軾的仕宦生涯，為國為民，不辭辛勞地在大江南北往來奔波。乍看之下，他的詩好像真如王文誥所說的跟陶詩毫不相關，但是細看以後，這首詩在很多地方跟陶詩故意唱反調。陶說車馬，蘇言舟船；陶指陸地，蘇論水路；陶避免喧鬧，蘇與喧聲為侶；他人詢問陶，蘇卻詢問他人；陶保持清醒，蘇沉醉在夢鄉中；陶詩以黃昏結尾，逐漸趨向黑暗，蘇詩代之以晨曦，逐漸奔向光明；陶穩如南山，蘇超越千重山；陶詩充滿自得之情，蘇詩有嗟嘆之意。蘇軾刻意的從相反的角度來和陶，是要顯示他不像陶潛一樣一定要追求寧靜安穩的生活。他的生活是動態的，充滿有如浪濤波動似的浮沉與凶險。在他遭受政治迫害的大半生中，他不怕他的小舟會被無情的浪濤所吞噬，即使在生死關頭，仍然可以無憂無慮地進入夢鄉，享受生活中片刻的寧靜。

元豐二年(1079)，蘇軾被囚禁在御史臺獄，面臨死亡的陰影時，他仍然能夠酣睡如常。何遠的《春渚紀聞》說就是蘇軾這種臨事不懼的坦然心態消除了神宗對他的疑慮，促使神宗決定對他不處重刑：

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一人排闥而入，投篋於地，即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轉仄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⁴⁸

蘇軾在詩中嗟嘆，並不是他對旅途的勞苦有所抱怨，而是對他輔佐君王平治天下的心願還沒達成而覺得惋惜。陶潛的詩雖然在藝術表現的技巧上很成功，但是他的眼界，確像李白所說的相當狹隘，基本上他所看到的只是個人安適的問題。這種只重個人安逸的思維就是陶潛自己有時也覺得難以完全接受，所以他在〈飲酒〉詩中稍後

⁴⁸ 何遠：《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六，頁86-87。

對此又再度提出討論，藉此一方面來消除內心的歉疚與不安，一方面冀望取得他同儕的諒解。上面這段分析應該可以證明我早先提出的論點：蘇軾的和陶詩不但跟陶潛的詩有密切的關係，而且一定要在跟原詩相比的時候，才更能看出它的深意。

現在我們跳到第十首看陶潛和蘇軾對仕宦的評語。陶潛覺得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充滿困難與險阻：「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仕宦主要的目的就陶潛來看不是治國平天下，而是生計的問題。如果為了糊口把自己的人格出賣甚至犧牲了性命，他以為不是很理智的事。所以當他在宦途遭遇艱險，覺得最好的對策就是歸隱家園，追求明哲保身之路。蘇軾和這首詩和得很有趣味。照理說他應該就他在政壇上所遭遇的種種折磨跟迫害去寫，他大可以說在王安石掌政的時候，王安石指使他的姻親、身任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的謝景溫誣告他的事；他更可以說因他的詩中有替老百姓訴苦，像「老翁七十自腰鎌，……邇來三月食無鹽」的句子，結果在元豐二年先後被諫官何正臣、舒亶和李定參劾，隨後被捕，於是在長江企圖投水自盡的慘痛經歷；他還可以說他在御史臺獄被關了四個多月，受了多次的審問折磨，最後又被貶到黃州，度過了五年艱辛的歲月；他也可以說最近幾年朔黨在朝處處設計誣陷他的陰謀。如果要寫個人親身經歷的政治風險，蘇軾應該是絕對比陶潛有資格去描述的，但耐人尋味的是他在和這首陶詩的時候，立意卻跟陶詩完全相反，根本不提政治上的風險。他寫了如下一首非常逍遙自在的詩：「籃輿兀醉守，路轉古城隅。酒力如過雨，清風消半途。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我緣在東南，往寄白髮餘。遙知萬松嶺，下有三畝居。」他描寫自己做官的情形很是輕鬆愜意，一點也不傷腦筋，就如同別人用轎子抬著他，而他在轎中悠閒地賞景一般。這個意象並不誇張，蘇軾從他出仕以來，政治長才即為時人稱許。

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命蘇軾做開封府推官，希望藉京師繁重的行政事務來纏縛他，期望他出醜，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蘇軾「決斷精敏」，⁴⁹聲譽反而更加高漲。費袞的《梁溪漫志》有一條關於蘇軾在杭州做知州的記載，描述他的行政才能，寫得相當生動：

東坡鎮餘杭，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坡則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汎舟絕湖而來，飯于普安院，徜徉靈隱、天竺間。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據案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辨訟，談笑而辦。已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鐙火，縱觀太守。有老僧，紹興末年九十餘，幼在院為蒼頭，能言之。當是時，此老之豪氣逸韻可以想見也。⁵⁰

⁴⁹ 《宋史·蘇軾傳》，頁 10804。

⁵⁰ 《梁溪漫志》，卷四，頁 1。

蘇軾這種超人的行政能力，不要說陶潛比不上，中國歷史能夠跟他相提並論的也實在不多。蘇軾親身經歷了恐怖的政治風險，但在和陶詩的時候，他卻跟陶潛相反，故意寫為政閒逸的一面。蘇軾藉著這種強烈的對比，似乎在暗中鼓勵陶潛一類的隱君子，希望他們也能夠像自己一樣，不畏權勢，不懼風險，一心為平治天下的政治理想而獻身。

一般學者推崇陶潛，把他的隱遁說得清高無比。⁵¹南宋朱熹曾經說過：「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卻真個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物也。」⁵²朱子的話說得有些偏頗。做官掌權是古代儒者施展政治抱負的唯一途徑，本身並沒好壞優劣可說，真正的問題是在做官掌權以後怎麼去運用一己的影響力。如果做官掌權只是為了滿足一己的私慾，不顧他人死活，這種行為不值得讚揚；如果做官掌權是為了治國平天下，達到天下大同的目的，這個官就一定要做，而這個權也就一定要掌，這種行為絕對值得讚揚，也值得鼓勵。就陶潛的情況來說，他不是像朱子所說的，真的不要官。其實他不反對做官，他脫離了政治世界，最主要是他不願意為政治理想去犧牲，他的命顯然要比政治理想重要得多。他寧願窮途潦倒地過他的一生，而不願轟轟烈烈地在政壇上尋求有利民生社稷的建樹。他在〈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中就說對做烈士沒興趣：「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⁵³其實在東晉和宋初陶潛所處的時代中，亂雖說亂，但並不是所有的官吏都是貪官污吏，也不是每個清官都被砍頭了。像顏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⁵⁴做官做到老，並沒被砍頭。唐朝一代賢相房玄齡在他主撰的《晉書》裏就說得很清楚：

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薦興，艱虞孔熾，遂使姦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壺之亡驅鋒鏑，……張禕飲鳩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⁵⁵

跟他同一時代的烈士相比，就如陶潛自己所說，「高操非所攀」，他置身事外遇事退縮的態度是絕對沒有甚麼高操可說的。尤其當晉安帝被桓玄篡位，遷到陶潛的家鄉

⁵¹ 參閱陳美利：《陶淵明探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頁88-192。

⁵² 《朱子語類》（臺北：正中書局，1962年），卷三四〈子謂顏淵曰章〉，頁5249。

⁵³ 《陶靖節集》，頁37。

⁵⁴ 《宋書》，頁1093。

⁵⁵ 《晉書》，卷八九，頁2298。

尋陽的時候，⁵⁶他在詩文中一個字都不提。這種只圖個人安逸，不顧君王死活的作法，是絕對不能當做忠臣來看的。他這種詩句從當時身遭噩運的安帝的角度來看，甚至可以說是風涼話。李白說他「齷齪東籬下」，杜甫說他「未必能達道」，王維說他不能謙下忍耐，以致一生潦倒不堪，不是沒有原因的。

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是陶潛早年出仕的時候，他曾經為當時就已經背叛朝廷的桓玄做過幕僚。歷史上為陶開脫罪名的大有人在，以往他們在主觀認定陶潛清高的前題下都否認有這件事。現在學術界逐漸接受這種說法，因此有的學者又認為陶是被迫做桓玄僚佐的。⁵⁷我個人就歷史上的證據及陶潛的個性來看，以為陶潛不但做過桓玄的幕僚，而且還是自願的。首先，陶潛在安帝隆安四年庚子歲（400）寫的詩〈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已經說到他奔走仕途的景況：「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這時他心中已有辭官的念頭。次年辛丑歲（401），〈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再度提到他退隱的意念：「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這首詩同時提到江陵是他任職的地方。據《宋書·州郡志》，江陵此時是荊州的府治，⁵⁸而荊州刺史當時是桓玄。《宋書·安帝紀》隆安三年有這麼一段記載：「十二月，桓玄襲江陵，荊州刺史殷仲堪、南蠻校尉楊佺期並遇害。」⁵⁹《晉書·桓玄傳》說在他殺害殷仲堪和楊佺期以後，「乃表求領江、荊二州。詔以玄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⁶⁰桓玄從隆安三年（399）左右開始做荊州刺史一直做到元興元年（402）率軍攻入京師為止，一共有兩年多的時間。⁶¹就上邊所引的詩句來看，陶潛既然說「久游戀所生」，他給桓玄做幕僚自然應該有頗長的一段時日。就歷史上的記載來看，在隆安二年（398），陶潛寫〈庚子歲〉一年多以前，「廣

⁵⁶ 同上注，卷一〇，頁 256。

⁵⁷ 魏正申《陶淵明評傳》（北京：文津出版社，1996年）說：「陶彭澤三十五歲第二次入仕，在桓玄幕任職，出於被迫。」（頁 201）其實在宋朝就有人主張這種說法，例如宋人吳仁傑在其《陶靖節先生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中就說：「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不傷生，迫之仕則仕，不以輕犯其鋒。」（頁 14）

⁵⁸ 《宋書》，卷三七，頁 1117。

⁵⁹ 《晉書》，卷一〇，頁 252。

⁶⁰ 同上注，卷九九，頁 2589。

⁶¹ 龔斌《陶淵明論傳》說：「自隆安三年己亥（399）十二月桓玄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至元興三年桓玄敗亡，荊州刺史一直是桓玄，未別授他人。」（頁 261）這種說法是不確實的，據《晉書·桓玄傳》的記載，桓玄在進京以後就不再做荊州刺史，而「以兄偉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頁 2591）。

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舉兵反」。⁶² 桓玄當時不遵朝廷命令，沒去廣州赴職，「既而詔以玄為江州」。⁶³ 同年九月，桓玄因王師追剿，跑到尋陽。十月，「仲堪等盟於尋陽，推桓玄為盟主」。⁶⁴ 桓玄跟陶潛應該就是在這一段時間相遇的。陶潛既然是尋陽當地的望族，他的外祖父孟嘉又曾經是桓玄的父親桓溫手下的參軍和長史，同時桓玄正在以肅清朝政的名義招攬地方上的人才，以對抗在京師擅權的會稽王司馬道子。桓玄既被眾人推為盟主，顯然在地方上頗孚人望。他請求陶潛相助，陶潛因此答應入幕的可能性極大。要不然《宋書》是不會批評陶潛的：「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⁶⁵ 所謂「不潔去就」應該就是指陶潛做桓玄幕僚的這件事。

在說明我所以認為陶潛曾為桓玄僚佐的原因之後，我再進一步探討他是否被脅迫入仕的問題。在上邊所引的〈庚子歲〉和〈辛丑歲〉兩首詩中，陶潛不但沒說一個被脅迫的字，他還進一步說他的官位是一個「好爵」。雖然陶潛不習慣也不喜歡仕宦的生活，但他因一己的經濟需要及政治抱負卻有些捨不得丟棄那個官位。他的〈飲酒〉詩就說的很清楚，他入仕最主要是為了家庭的生計：「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他年輕的時候也有他的政治抱負，所謂「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擬古之八〉），就是說他這時積極參與政治的心態。他所以辭官，最主要的原因是上文提過的，他認為當時的政治氣候惡劣，如果為了官位而丟棄生命是很不值得的事（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仕與不仕牽涉到個人的價值判斷，他人是無法勉強他的，但是一個人如因政治風險而脫離政治，就絕對不能因此稱他為清高。

在這一點上蘇軾跟陶潛就完全不同。他小時候接受母教，就已經立志要做一個烈士了：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⁶⁶

范滂這個非常有氣節的人，做官做了不久，就因黨錮之禍而首身異處。雖然當時接到詔書的縣官要放他活命，他不願意逃亡，一心只希望捨身成仁，結果死的時

⁶² 《晉書》，卷一〇〈安帝紀〉，頁 250。桓玄背叛晉廷並不是在陶潛離開桓玄的幕府以後才發生的，早在隆安二年，桓玄與楊佺期就已經「舉兵反」，〈安帝紀〉記載那年八月「桓玄大敗王師於白石」。

⁶³ 《晉書》，卷九九〈桓玄傳〉，頁 2588。

⁶⁴ 同上注，卷一〇〈安帝紀〉，頁 251。

⁶⁵ 《宋書》，頁 2288。

⁶⁶ 《樂城集·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頁 1411。

候才三十三歲。⁶⁷蘇軾幼年的時候就已經許諾他母親，要做范滂一樣的烈士，為國家社稷獻身。這種態度一直到他第二次被貶到南荒之地的時候都沒改變：「許國心猶在。」⁶⁸這就是蘇軾和陶的時候，不但不強調政治上的風險，反而特別描述它悠閒一面的主要原因。

我在分析第五首的時候，很簡單地提到陶潛對他自己只圖個人安逸而不求國家社稷福祉的做法有時候也覺得頗不安。例如在第十二首，他就自問：「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他這種內心的交戰在第十五和第十六首就更清楚地顯示出來：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這兩首詩寫得很悲悽，感傷之情溢於言表。陶潛窮的沒錢整修房子庭院，以致住處就如同荒野一般。同時因他沒有顯達的地位，很少人跟他往來，所以他家的四周圍只見成群的飛鳥而不見人蹤。更讓他傷心的是，歲月不饒人，他不再年輕，頭髮已逐漸斑白。有些學者把第十五首的最後兩句說成陶潛對自己潦倒的情況看開了，決定不再去計較，但這種說法與前八句的旨意不很相合。這首詩前八句都在說陶的淒涼景況，他不太可能在結尾的時候會突然無緣無故地說他不介意。如果他真不介意的話，他應該不會用幾乎一整首詩來描寫他淒涼的景況，更不會在〈飲酒〉的最後一首請求人們諒解他：「君當恕醉人。」我以為第十五首的最後兩句應該是說他覺得他似乎應該東山再起，以免以往的報國情懷與抱負就此永久埋沒。

上邊我的說法不但跟第十五首前八句的旨意吻合，也跟下一首的詩意互相銜接。第十六首從他往日所持的抱負開始論起，說他早年喜好六經，遵從儒家的學說，出仕尋求進取的機會。但不幸的是，他一直沒能得到如孟公一樣的賢人賞識，因而沒有機會施展報效國家的抱負。清代學者邱嘉穗說「敝廬交悲風」的悲風是指當時黑暗的政治情況，「荒草沒前庭」的荒草是指當時的政治小人：「悲風比世亂，荒草比小人。」⁶⁹他的說法有些牽強，其實這個意象更有可能是描寫陶潛內心暗淡淒涼的心靈世界，他的感情與外界的景象合而為一。陶潛這種淒涼的感觸和他窮苦的景況是很

⁶⁷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六七〈黨錮列傳〉，頁2207。

⁶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望湖亭》，頁3335。

⁶⁹ 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原書未見，據《陶淵明詩文集評》（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頁190引。

讓蘇軾同情的，所以蘇軾在他的和詩中就說：「每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蘇軾是一個心胸開闊、樂天知足的人，在他寫的幾千篇詩詞文章中，我們找不出甚麼非常悽慘自哀的句子。所以他在和第十五跟十六首的時候，就撇開陶潛的感傷，而說他跟弟弟的天倫之樂。我在此只引第十六首做例子：

曉曉六男子，絃誦各一經。復生五丈夫，戢戢丁欲成。歸田了門戶，與國充踐更。普兒初學語，玉骨開天庭。淮老如鶴雛，破殼已長鳴。舉酒屬千里，一歡愧凡情。

蘇軾的妻子王弗生了一個兒子，名叫邁；繼室王閏之生了兩個兒子，名叫迨和過；侍妾朝雲生了一個兒子，名叫遯，不滿周歲的時候就夭折了。所以蘇軾長大成人的兒子一共有三個。他的弟弟也有三個兒子，名叫遯、適、遜。他們這六個男孩子都非常孝順上進，頗得二蘇的風範。尤其蘇軾的第三子過，在他父親第二次南謫的時候，拋棄自己的事業，跟隨他父親到海南島，一路細心服侍。蘇過在紹聖元年(1094)離開大陸的時候，身當壯年，等他元符三年再回到大陸的時候，頭髮已經灰白：「丁年而往，二毛而歸。」⁷⁰

在享受天倫之樂這一方面，陶潛也是沒法跟蘇軾相比的。陶潛有五個兒子，個個都不長進。他曾經寫了一首〈責子〉詩來發洩心中的鬱悶：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立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兒子不爭氣，讓做父親的心煩，以致喝酒喝得更厲害。但是話又說回來了，俗語說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們之所以不爭氣，跟他自己嗜酒，生活沒節制，喝酒常喝得爛醉不是一點都沒關係的。如果所有五個孩子都不成器，做父親的絕對要負一些責任，而不能說「天運苟如此」那樣的話，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老天。除了〈責子〉以外，陶潛另外還寫了一篇頗長的詩，名叫〈命子〉，一共三百二十個字，也是教訓兒子的。這首詩從陶唐開始說他的家世以前是如何的光彩，但說到了他自己的時候，就沒甚麼功業好提，只能表示慚愧：「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⁷¹他對兒子有些指望，但是這些指望似乎在口頭上說說也就罷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實如真是要教訓兒子，做父親的可以罵一頓，甚至打一頓，大概沒有人會像陶潛轉彎抹角地去寫一篇又長又難的詩給兒子看。陶潛的兒子既然

⁷⁰ 蘇過：《斜川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卷六〈志隱〉，頁七上。

⁷¹ 《陶靖節集》，頁10。

「總不好紙筆」，大概根本也不會去看的。因此陶潛寫這首詩主要的目的應該還是為了世上的讀者，他隱然希望後世的讀者不要把他當成一個不負責任的父親來看。陶潛在臨終的時候，良心顯然不安，覺得對不起小孩，他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使汝幼而飢寒耳。……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⁷²我早先提過，陶潛家貧，有的一點餘錢往往都被他喝酒給喝掉了，顯然沒存甚麼錢給還沒成人的孩子。他臨死的時候才表示不安，畢竟遲了些。此外，就陶潛臨終前對他們的囑咐來看，他的兒子可能常有鬪牆之爭：「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弟兄之義。」他從歷史上舉了四個例子，希望他們也能夠和協相處：「兄弟同居，至於沒齒。」陶潛自己不太能跟別人相處，逃離了政治世界，而死前卻要兒子培養和諧的人際關係，這似乎不是很切合實際的期望。

陶潛〈飲酒〉最後四首詩大體上還是以不同的角度來繼續申辯他不願意從政的原因。在第十七首中，他擔心會身遭橫禍：「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第二十首說他所處的是一個黑暗的世界：「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全詩最後的結尾我在上邊已經引過，陶潛請求他的讀者諒解他：「但恨多繆誤，君當恕醉人。」可以想見，蘇軾的詩跟陶潛大不相同。蘇軾不以為他的世界黑暗，他反駁陶潛的看法，說：「誰言大道遠？正賴三杯通。」他以一個行政長官的身份去勸同僚，要他們關心民間疾苦，與民休息：「四海瘡痍新，三杯洗戰國。」他認為在新黨大事聚斂之後，民不聊生，全國的行政長官包括天子在內都應該持飲酒時心身放鬆的態度，參照漢朝丞相曹參「不事事」的作法，⁷³ 避免騷擾民間，處處寬大，給窮苦百姓一條生路。蘇軾第二次被貶謫時，雖然他不再處理實際行政事務，但理念並沒改變，他的〈和陶歸園田居〉仍然表示對世界有著高度的期望：「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限景，寓我有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為不二價，農為不爭田。」⁷⁴ 在他的眼中，左鄰右舍都是懷有匡世濟俗情懷的聖賢之徒。

蘇軾晚年在長達幾乎七年之久的貶謫生涯中，度過了他生命中最晦暗的時刻。他是舊黨大臣中被貶得最厲害的一個——從定州貶到英州，英州到惠州，惠州到海南島，一路情況岌岌可危。雖說哲宗是他以前的學生，但是主要因為他先前做過哲宗祖母宣仁太后的侍從長，而哲宗對他祖母銜恨甚深，所以連帶對他祖母所信靠過的不少大臣，特別是直言敢諫的蘇軾也深表不滿。當時為相的章惇，早年雖跟蘇軾相善，之後因新舊黨爭，早已成陌路人，這時為了鞏固權勢，對舊黨要員，尤其是才華四溢的蘇軾更是極其迫害之能事。在這種困境中，陶潛對他的政治作用，因此較前更為提高。蘇軾就是在這段期間，把陶潛推尊為中國詩人之首，並且寫下大量的和

⁷² 《宋書·陶潛傳》，頁 2289。

⁷³ 《漢書》，卷三九〈曹參傳〉，頁 2019。

⁷⁴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頁 3380。

陶詩。可是即使是在蘇軾特別推尊陶潛的這個時期，蘇軾的和詩還是跟陶詩處處相左。在此再引蘇軾的〈和陶詠荊軻〉一首為例，比較它跟陶詩的不同之處：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召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饑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寄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滿，集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魏韓裂智伯，肘足本無聲。胡為棄成謀，托國此狂生。荊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殺父囚其母，此豈容天庭。亡秦只三戶，況我數十城。漸離雖不傷，陸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

蘇軾的這篇作品名義上是一首和詩，實質上是一首反陶詩。他藉著荊軻刺秦王的這樁歷史事件來否定陶潛對政治運作的看法。

有的學者認為〈詠荊軻〉是陶潛早年的作品，有的以為是他棄絕仕宦生涯十多年後的作品。⁷⁵就內容來看，這首詩應該是作者早年對仕宦頗為熱衷時所作。即使是晚年的作品，因陶潛一生做官做得不久，官位也不很高，政治閱歷有限，所以他對政治運作的看法頗簡單，跟常人差不多，主要著重個人英雄式的表現。他以為政治上的大問題只要一兩個人就可圓滿解決。荊軻願意為太子丹效身刺殺秦王，頗有些英雄色彩，因此在他的詩中，便成了一個了不起的烈士：「召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蘇軾是在紹聖三年（1096）惠州貶所上寫的這首和詩，當時他已經是飽經風霜的政治人物，知道政治上的大問題往往牽涉到很多層面，絕不是一兩個人憑著血氣之勇朝夕之間就能順利解決的；如要徹底解決重大問題，一定要有耐心，須多方設想，廣集意見才智，深謀遠慮，方能達長治久安之道。因此在蘇軾眼中，荊軻只是一個喜歡喝酒動刀子的刺客，⁷⁶不值得一提：「托國此狂生。荊軻不足說。」蘇軾刻意以狠毒的「李客卿」來和「荊卿」，強調荊軻在政治上的負面作用。陶詩把燕太子丹和荊軻一類尊為當時的英雄豪傑：「四座列群英。」蘇詩卻以為太子丹既無耐性，又無深謀遠慮，同時誤信荊軻：「太子少不忍，顧非萬人英。」正因中國政治傳統一般過份重視個

⁷⁵ 鄧安生：《陶淵明年譜》（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97-98。

⁷⁶ 《史記》（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卷八六〈刺客列傳〉云：「荊軻嗜酒。」（頁1583）

人英雄式的表現，缺乏和諧的團隊諮商精神；如王安石一朝得勢，就把滿朝大臣說得一文不值，⁷⁷ 同時又缺乏耐心，希望國家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能因他的新法變得強大；司馬光也是一上臺，誰的意見也不聽，不論好壞，迅即把王安石的新法盡行廢除。⁷⁸ 這種一意孤行、不願廣納眾意的做法其實是一般政治的致命傷，這點蘇軾最清楚不過，難怪他會面對古史而發出深深的嘆息：「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

結 論

上文清楚的顯示，蘇軾的和陶詩跟陶詩往往大相逕庭，尤其是陶潛在談到隱遁與內心苦悶的時候，蘇軾常常跟陶潛唱反調。他讚揚陶潛耿直的個性，佩服他不盲目追求利祿的行為，高舉他做為中國士人特別是他當代那些唯利是圖的官僚的模範。但是他不同意陶潛隱遁的行為，他希望類似陶潛的隱者都能像他自己一樣——不懼權勢，不怕死亡，不以利祿為重，而以國家社會福祉為目標來獻身世界。蘇軾個人特殊的政治動機促使他把陶詩列在李白、杜甫之上。蘇軾在他死前不久，從海南島內遷。當時朝局大新，他對前景再度充滿了希望，陶潛對他已不再具有太多的政治意義，他寫的最後一首和陶詩就直接了當地說：「淵明墮詩酒。」但奇怪的是，他這一貶抑陶潛的話後世往往避而不提，因此世人多有一個錯覺，以為蘇軾真是對陶潛的為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自此以後，陶潛在中國文學史上幾乎成為一個完人，他所有的詩也似乎都變得十全十美了。

二十多年前在美國史丹福大學任教的劉若愚曾在他寫的《中國詩學》(*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裏提到「醉」這個字在英文裏跟中文有不太一樣的含意。他說「醉」這個字在英文裏往往都是表示不好的意思，而在中文特別是詩詞裏卻表示正面的意思：

⁷⁷ 黃以周等《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七云：「安石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曰：『公輩坐不讀書爾。』扞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皋、夔、契之時，有何書可讀？』」(頁309)

⁷⁸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引《編年備要》云：「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雇役為未便。純仁、軾、惇雖賢否不同，然悉聰明曉事，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其所主。元祐初，光復差役，惇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講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光不以為然。……蔡京時知開封府，用五日限改畿縣雇役之法。至是惇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議，除京為戶部尚書兼提舉。於是京欲掩蓋元祐迎合之跡，乃白惇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惇信之，遂請人額，雇直一從元豐舊法。」(卷一〇，頁408)王安石、司馬光、章惇這些歷史上有名的人物，不論賢否，都是一當權就一意孤行，不體恤眾意。

“[In Chinese] poetry *tsuei* does not mean quite the same thing as ‘drunk’, ‘intoxicated’, or ‘inebriated’, but rather means being mentally carried away from one’s normal preoccupations.”⁷⁹ 其實「醉」這個字在中國詩裏，並不都是表示很好的意思，像《詩·小雅·賓之初筵》就是描寫一個人醉後失去理智而做出荒唐的事：「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日既醉，不知其郵。」⁸⁰ 當然，飲酒並不一定是壞事，但是酒具有麻醉的作用，多喝的人會失去理智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而且常喝容易上癮，上癮後對身體的健康也會有非常不良的影響。孔子說他自己能「不為酒困」，⁸¹ 這顯示出一般人喝酒而能不為酒困的並不是特別多，這也就是為甚麼大禹戒酒的原因：「禹惡旨酒。」⁸² 尤其是一個人喝醉酒以後，常常甚麼壞事都做得出來，例如唐代倒數第二個皇帝昭宗，據歐陽修和宋祁寫的《新唐書》說，他「為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⁸³ 但《舊唐書》說他跟陶潛一樣在遭遇挫折之後也開始嗜酒：「帝自華還宮後，頗以禽酒肆志。」光化三年(900)快到年底的時候，有一天他「醉甚。是夜，手殺黃門侍女數人」，⁸⁴ 並因此而引發政變。醉酒在中國詩中被美化，與魏晉那些包括陶潛在內的頹唐的知識份子有絕大的關係。⁸⁵ 以基督教為主流的西方社會對酗酒一向強烈反對，美國從1920年到1933年甚至全國禁酒。⁸⁶ 歐美社會之所以貶抑喝醉酒的人，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聖經〈哥林多前書〉第六章第九至第十節說：「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國麼。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國。」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科學的實證，一個喝醉酒的人，實在沒有甚麼自我控制的能力。美國現代社會基於科學的數

⁷⁹ James J. Y. Liu,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p. 58–59. 我提到他是因為他當時在美國是中國詩詞數一數二的權威。我跟他有過一面之緣，他因在婚姻上遭到挫折，內心煩悶，常常借酒消愁，結果得了不治之症，去世時才六十歲。

⁸⁰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700。

⁸¹ 《論語》，《四書集註》本(臺北：世界書局，1966年)，〈子罕〉，頁59。

⁸² 《孟子》，《四書集註》本，〈離婁下〉，頁116。在中國政治史上大禹應該是第一個對酗酒的害處具有真知卓見的聖者：「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大禹所以「惡旨酒」應該不是說旨酒本身有可惡之處，而是酒對人身心可能造成的戕害，確有令人痛心疾首之處。據現有的史料，我們無法確知為甚麼大禹對酒可能造成的弊端會有那麼深切的認識。我個人的揣測是他極可能親眼見過一些沉淪在酒中結果失去理智的人。他的父親鯀治水失敗，被處極刑，或者跟酒有關。

⁸³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一〇〈哀帝記〉，頁305。

⁸⁴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二〇上〈昭宗紀上〉，頁770。

⁸⁵ 劉伶的〈酒德頌〉描述他們放縱的心態說得簡明扼要：「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晉書》，頁1376)

⁸⁶ 參閱 David M. Kennedy et al., *The American Pageant: 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12th e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2), pp. 732–34。

據，對多喝了一些酒的駕駛人（即使他們沒醉），定有相當嚴厲懲罰的條文。道理很簡單，一個喝醉酒的人，自以為非常清醒，結果開車上路，常在撞死路人甚至在路上執法的警察以後還不清楚發生了甚麼事。

政治誠然帶有危險，特別是在亂世的時候，不但臣子可能被殺，君王也常被弑，唐昭宗被朱全忠弑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一個國家因為政治動亂，如蘇軾所引述「為君難，為臣不易」，結果做君王的決定不做君王，做臣子的決定不做臣子，大家都沉醉在酒中，這是逃避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孔子在匡的時候，因為匡人誤認他是陽虎而把他和他的弟子扣留了幾天，「弟子懼」，⁸⁷ 孔子就說：「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是循著這種無畏的精神而遇難的。政治情況不理想，正是正人君子應該更積極參與的時候。正因為當時清廷很腐敗，孫中山先生才立志要革命。如果因為危險而逃遁苟且，宣稱「高操非所攀」，這不是一種負責任的行為。我們不必因陶潛墮落以前有關心國事的傾向，就把他當做完人來看，就像我們不因昭宗墮落以前有興復之志就把他尊成聖王是一樣的道理。真正值得我們佩服的應該是那些不計生死，為人為國，獻身社稷像蘇軾、孫中山等一流的人物。蘇軾晚年被貶到海南島，在渡海前一天晚上，因喝酒而惹出病痛，呻吟了一個晚上，他弟弟也因此被鬧得整夜沒睡，那時他就趁著機會勸他哥哥戒酒。⁸⁸ 所以蘇軾對陶潛最終的評語還是根據他自己親身經歷的折磨而做出公允的論斷。

上面是針對陶潛的為人而下的結論，現在我就他的詩做一總結。中國詩的發展在《詩經》的時代主要是以四言為主，到漢魏晉以五言為主，下逮唐代又以七言為主。因為字數增加，詩的形式、結構、意象及情感的表達也逐漸變得更為豐富與複雜。陶潛在五言詩的創作上頗有成就，但是作品不多，主旨又往往局限在飲酒與個人的安逸上，所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⁸⁹ 就如李白所說，實嫌狹隘，跟杜甫包羅萬象的主題來比是相形見絀的。中國詩確是要等到唐代李、杜的詩出現以後，才在文字、意象、情感與氣勢上達到巔峰的狀態。例如杜甫七言的〈秋雨嘆〉及〈三絕句〉、五言的〈春望〉及三吏三別，傳誦千古，寫盡中華民族個人與國家命運相結合的感人情懷，這類動人心絃、令人一倡三嘆的作品，就我來看，絕不是陶潛詩所能望其項背的。

⁸⁷ 《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頁 1175。

⁸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和陶止酒並引》，頁 3489。

⁸⁹ 《陶靖節集·遊斜川》，頁 17。

“Yuanming Fell into Wine and Verse”: Su Shi’s *He Tao Shi* and a Re-evaluation of Tao Qian’s Poetry

(A Summary)

Vincent Yang

In the eyes of many modern Chinese critics Tao Qian towers as a supreme poet. Both his person and works have commanded exuberant praise. However, during the long stretch of time from Tao’s own era until more than half a millennium after his death, he had been by and large seen only as a secondary poet. His rise to pre-eminence owed chiefly to Su Shi’s devoted promotion of his works. Taking Su’s statement identifying himself with Tao at its face value, critics tend to stress their resemblance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difference and thereby argue that the former, like the latter, exhibits in his *He Tao shi*, poems written to match Tao’s, a similar desire to flee from the political arena to a seclusive world of his own. This essay demonstrates that Su and Tao, notwithstanding their similarities, stand as far apart from each other as the two ends of a pole. In fact, while seemingly exalting Tao, Su never ceases to be critical of Tao, so much so that in many ways the matching poems are actually the very antipodes of Tao’s works. Motivated by his political needs, Su’s promotion of Tao serves mainly as a ploy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his foes away from him. Failing to see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Tao to Su and Su’s subtle yet consistent criticism of Tao, critics in general have since then hailed Tao as a poetic embodiment of perfection. In re-evaluating Tao’s poetry, this essay removes from Tao the halo with which critics have arbitrarily enshrouded him and presents instead his person and poetry in light of textu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關鍵詞：酒 退隱 政治 高操 批評

Keywords: wine, seclusion, politics, high principles, criticism